



世纪前沿

In Search of Politics

[英] 齐格蒙·鲍曼 著

Zygmunt Bauman

洪涛 周顺 郭台辉 译

寻找政治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寻找政治

[英] 齐格蒙·鲍曼 著 洪涛 周顺 郭台辉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寻找政治 / (英) 鲍曼 (Bauman, Z.) 著; 洪涛等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

书名原文: In Search of Politics

ISBN 7-208-05871-7

I. 寻... II. ①鲍... ②洪... III. 政治理论 IV. D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12590 号

责任编辑 杨承斌 田 青

装帧设计 陆智昌

寻找政治

[英] 齐格蒙·鲍曼 著

洪 涛 周 顺 郭台辉 译

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发 行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

印 刷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635 × 965 1/16

印 张 14

插 页 4

字 数 183,000

版 次 2006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208-05871-7 / D · 1017

定 价 22.00 元

出版说明

自中西文明发生碰撞以来，百余年的中国现代文化建设即无可避免地担负起双重使命。梳理和探究西方文明的根源及脉络，已成为我们理解并提升自身要义的借镜，整理和传承中国文明的传统，更是我们实现并弘扬自身价值的根本。此二者的交汇，乃是塑造现代中国之精神品格的必由进路。世纪出版集团倾力编辑世纪人文系列丛书之宗旨亦在于此。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包涵“世纪文库”、“世纪前沿”、“袖珍经典”、“大学经典”及“开放人文”五个界面，各成系列，相得益彰。

“厘清西方思想脉络，更新中国学术传统”，为“世纪文库”之编辑指针。文库分为中西两大书系。中学书系由清末民初开始，全面整理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学术著作，以期为今人反思现代中国的社会和精神处境铺建思考的进阶；西学书系旨在从西方文明的整体进程出发，系统译介自古希腊罗马以降的经典文献，借此展现西方思想传统的生发流变过程，从而为我们返回现代中国之核心问题奠定坚实的文本基础。与之呼应，“世纪前沿”着重关注二战以来全球范围内学术思想的重要论题与最新进展，展示各学科领域的新近成果和当代文化思潮演化的各种向度。“袖珍经典”则以相对简约的形式，收录名家大师们在体裁和风格上独具特色的经典作品，阐幽发微，意趣兼得。

遵循现代人文教育和公民教育的理念，秉承“通达民情，化育人心”的中国传统教育精神，“大学经典”依据中西文明传统的知识谱系及其价值内涵，将人类历史上具有人文内涵的经典作品编辑成为大学教育的基础读本，应时代所需，顺时势所趋，为塑造现代中国人的人文素养、公民意识和国家精神倾力尽心。“开放人文”旨在提供全景式的人文阅读平台，从文学、历史、艺术、科学等多个面向调动读者的阅读愉悦，寓学于乐，寓乐于心，为广大读者陶冶心性，培植情操。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大学》）。温古知今，止于至善，是人类得以理解生命价值的人文情怀，亦是文明得以传承和发展的精神契机。欲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先培育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由此，我们深知现代中国出版人的职责所在，以我之不懈努力，做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文化脊梁。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编辑委员会
2005年1月

致 谢

余受惠于戴维·罗伯茨之远见卓识、孜孜不倦而善察人意之编辑作风，已有十余载。藉此机会，感谢他为作者与读者之间的畅达沟通所做的一切。

感谢《卫报》(The Guardian) 允许作者与出版社摘录戴克·埃肯海德 (Decca Aitkenhead) 刊于《卫报》1998年1月23日与1998年4月24日之文章，两篇文章的版权均属《卫报》。

导 言

信念要使人信服，并不一定得逻辑一致。当今使人信服的信念（吾辈所持之信念）亦不例外。事实上，我们认为，至少在世界的“我们这一边”，人之自由乃显而易见，除了还需在某些地方略加调整之外，可以说已达到我们所能想像之完美境地。除了偶尔发些牢骚，无论如何都没有必要走上街头，要求比我们自认为已经具有的更多、更好的自由。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同样坚信，我们无力（无论独自地、还是各自地或共同地）改变世界事务之运转方式或被操纵之方式；我们也相信，即使能集思广益，想像出不同于已有的另一世界，并戮力使之呈现（倘以为它比我们身处的这一个更好的话），也终将徒劳无益，甚至属于黄粱一梦。凡受过逻辑思维之训练，要同时坚信这两种信念，是何等地不可思议。如若已经赢得自由，那么，关于一个更美好之世界的想像，造就尽善尽美之人的能力，便不属于这一胜利之战利品，这种想像与能力如何能产生？而那阻碍这一想像，放纵自由人对其相关事务之无能的，又是怎样的一种自由？

这两种信念彼此无法契合——但抱持这两种信念，并不意味着我们缺乏逻辑能力。这两种信念决非臆想。每一信念都可获得充分的共同体验的支持。对自身行事之信念，我们相当现实、理性。因此，弄清我们所身处的这一个世界为何源源不断地传递出如此明显矛盾之信息，是极其重要的。同样极其重要的是，要弄清我们如何生活在这类矛盾之中，还要弄懂我们何以在漫长时间中未曾意识到这一点，而我们意识到它时，我们也没有特别为此而感到烦心。

为什么弄清这些问题很重要？难道我们获得了此种知识，事情会

变得更好？可以肯定，对这些问题决不会有明确的回答。对事情起因之洞悉，既可以使我们束手就擒，亦可以使我们奋起抗争。众所周知，关于那种形塑我们周遭状态之复杂而不易觉察之社会机制是如何运作的知识，开出了两条路。它不断激发起两种截然不同的功能，皮埃尔·布尔迪厄精当地称之为“嘲讽”（cynically）与“诊疗”（clinical）。知识可被“嘲讽地”使用：世界如其所是地存在，这让我想到一种策略，即可以充分利用其法则来服务于自身利益；世界是否公正，是否讨人喜欢，无关紧要。如若作“诊疗式的”使用，那么，这种关于社会如何运作的同一种知识，就会帮助你我与那些我们认为不妥、有害或亵渎我们道德感的事件作更有效的斗争。知识本身并不能决定我们对它做何种使用。归根到底，这事关我们自己的选择。然而，没有这种知识，任何选择就无从展开。有这种知识，自由人至少有行使其自由之机会。

然而，什么是我们要认识的呢？这就是本书想要解答的问题。粗略而言，回答是：倘若在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之间的纽带不复存在，或者，永远无法再建这一纽带，换言之，倘若没有简便易行的方式，将私人忧虑转换为公共问题，以及反过来，从私人麻烦中洞悉并指示其公共问题的性质，那么，个人自由与集体无能就将同步增长。在我们的社会，这样的纽带总的来说比较缺乏，而在公共领域中亦很少实践这样的转换技艺。没有这样的纽带，介于私人与公共地带之间的零星交往的维持，就好像凭借气球之帮助，而气球在到达地面时（亦即，在抵达目的时），往往会胀破或爆裂，这种倾向着实令人恼火。转换技艺的当前状态令人遗憾，而弥漫于公共领域中的个别怨气充斥着私人的苦恼与焦虑，它们仅仅展现于公共领域之中，却无法转变成公共问题。

缺乏强有力的、持久的纽带，转换技巧未能付诸实践或全然被遗忘，这样，私人麻烦与痛苦就不会被归结在一起，也很难凝聚为一项共同事业。此情此景，有什么能将我们团结在一起？社会性可谓飘泊不定，徒劳地寻觅一块可以扎锚的坚实基础，寻觅得以凝聚人心的、所有

人都能看得见的目标，寻觅可以紧密团结在一起的同伴们。徘徊、误入歧途、无方向，到处都是这样。缺乏常规的出口，我们的社会性往往在一次性的壮丽的爆发中被释放——像所有爆发一样，瞬间即逝。

释放的时机有时来自同情与博爱的宴饮狂欢，有时来自反对新发现的公敌的更具侵略性的爆发（反对那些被大多数公共领域之成员认为是其私敌的人）；至于其他的，则来自大多数人同时感受到之强烈的悲喜事件，诸如国家队赢得世界杯冠军、黛安娜王妃悲剧性的死亡。尽管在这些时刻，烦恼被迅速地宣泄，然而，一旦返回日常事务，事情基本毫无损地回到其原初状态。当归属感的炫目闪光瞬间熄灭时，孤独者一觉醒来，发现依然寂寥如前，在片刻之前一度恍如白昼的共同世界似乎较以往更为黯淡。力量通过爆发被悉数释放，没有残留一点可再次点燃火花。

要改变这种状况之可能性，有赖于 *agora**——这是一个既非私人，亦非公共而同时恰恰又更私人、更公共的空间。在这空间里，私人问题以一种有意义的方式相遇，不仅仅是为自我陶醉之快乐，也不仅仅是为通过公共展示而寻找某种疗治，而是寻找一种集体操控之手段，其力量足以将私人提升出他们所遭受的私人性的不幸；这一空间可能产生这样的一些观念，并形塑为“公共之善”、“正义社会”或“共同价值”。麻烦在于，这个颇具古风的“私人/公共空间”迄今已荡然无存，而能取而代之的新空间依然渺无踪迹。古老的 *agora* 为雄心勃勃的发展商所霸占，改成了主题公园，而强权与政治冷漠共谋，坚拒任何新空间的重建。

1996年11月，科尼利厄斯·卡斯特里亚迪斯对丹尼尔·默梅特说，当代政治之最显著特征是其短钉琐屑：“政客们无能为力……他们不想做什么事情。他们只想坐在办公室里。”政府之更迭（即便“政

* *agora*，古希腊语，为（古希腊城邦之）集市、广场、会场，城邦公共生活之主要场所。——译者注

治阵营”的变换)，都不是什么分水岭，而至多只是一条小溪中的涟漪，朝自己的固有方向，呆滞地、义无反顾地、顺势不断地、无变化地流淌。百年前，自由主义政治的主流规划是“大跃进”：一种反叛的、冒进的意识形态。如今，“我们这个世界虽然不是所能想像的最好的，却是惟一真实的。而且，其他的选择更坏，必定会更坏，如果被付诸实施，它们的坏处就会显示出来”。诸如此类的话，不过是投投降而作的自我辩解。今日之自由主义可以归结为这样一个简单信条：“别无选择”。如果想找到日益浓厚的政治冷漠感的根源，倒不如把眼光收回来。我们的这种政治赞美一致性，助长一致性。一致性是自己选择的；人是否需要一致性的政治？无论政客们的政治色彩如何不同，何以他们的承诺都那样愈来愈相像呢？

倘若是民主政治的政治技艺，那就是将限制公民自由的藩篱拆除；不过，它自己也要设立藩篱：让公民获得自由，为的就是让他们能够个别地或集体地为他们自身（个体的或集体的）设立藩篱。第二个方面已经全然不为人所知。所有限制都是禁止。任何自我设限的尝试都被当作通往集中营的第一步，如在需求方面，要么选择市场独裁，要么选择政府独裁，别无他途；如在公民权的方面，除了消费主义，没有别的东西。这是金融市场与商品市场所容忍的方式，也是惟一容忍的方式。这也是当今政府倡导并培植的方式。在此领域，留下的惟一的宏大叙事（不妨再引卡斯特里亚迪斯的话），就是垃圾的堆积以及愈来愈多的垃圾的堆积。垃圾的堆积是无限的（所有限制都被看作是诅咒，这里不能容忍任何限制）。但如若自我设限，那么，这种自我设限必须从这种堆积开始。

但对自我设限的反感有其代价，这就是普遍的一致性以及作为结果而产生的政治的短钉琐屑，这是一种难以承受的代价。错误政治的代价通常要求立即偿付：人的苦难。苦难有多种形式，但都可以追溯至同一个源头。这些苦难都有自我持存性。它们源于政治的不当，也是政治清明的最主要障碍。

在当代的种种烦恼中，最险恶且最令人痛心者，可以纳入 *Unsicherheit* 的目下，这一德文词将各种体验融贯一处，故需三个英文词来表达：不确定性（uncertainty）、不可靠性（insecurity）和不安全性（unsafety）。奇怪的是，这些烦恼的本质在于它本身就是集体疗治的最大障碍：人们感到不可靠，为未来而小心翼翼，为安全而担忧，不敢面对集体行动所要求的风险。他们没有勇气去冒险，没有时间想像共同生活的其他方式；他们太专注于那些无法共同考虑的事务，根本谈不上把自己的精力奉献于那些必须共同承担的事务了。

现行政治制度的本意，就是要帮助人们摆脱这种不可靠的感觉，而事实上却无能为力。在一个迅速全球化的世界中，大部分的权力及其核心部分脱离了政治，政治制度很难提供可靠性或确定性。它们惟一能做的，也是它们经常做的，就是将四处漫延的焦虑转变为 *Unsicherheit* 的要素之一：安全。这是还能做点什么并且能见其成效的惟一领域。不过障碍在于，尽管采取行动以有效治愈或至少减轻不可靠感与不确定性需要一致行动，但在安全大旗下采纳的标准大多不同，它们播下了彼此猜忌、分裂的种子，促使人们去嗅出藏在任何争论和异议背后的敌人与阴谋家，而这最终只是令独行者较以往更加寂寥罢了。最糟糕的是，这些标准在远未击中焦虑的真正来源时，已经耗尽了它们从这种来源中产生的所有能量——倘若能够将这些能量加以疏导，使之服务于将权力归还于由政治所控制的公共空间，那将更有效。

为什么对“私人/公共空间”的需要如此贫乏，这是一个主要原因，同时也是少数仅存的空间在大部分时间中形同虚设，以致这些想要的东西在减少，至少在逐步退出的原因。凡在这些空间中发生的事情，都是无理的、不合逻辑的，这是减少与收缩的另一原因。假设有这样一个不同寻常的时刻，在“私人/公共空间”中充斥着渴望对引导性价值与法律问题进行争辩与讨论的公民，那么，有充足的力量来贯彻他们决议的机构又在何方？最强大的权力飘忽不定，最具决定性的决定所来自的空间远离 *agora*，甚至远离政治制度化的公共空间。对当今

政治制度而言，这些权力为它们所无法进入，也为它们所无法控制。因此，自我驱策与自我强化的机制将继续自我驱策并自我强化。Unsicherheit 的源头永不干涸，值得注意的是，挑战它们的勇气和决心，并未经过全面充分的考量；真正的权力依然与政治保持着安全的距离，政治若欲有所作为，也无能为力：以思想自由与行动自由之名，对人类缔结的所有形式，提出正当性的要求——如若后者拒绝或不能达到要求，就要求它们退出舞台。

这确是一个戈尔迪之结*——纠缠扭曲，难以分梳，只能快刀斩乱麻……对不可靠、不确定和不安全的放任与私人化，看来这就是症结之所在，若想拆解其他环节，只需在这个症结处挥刀。

显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从源头上治理不可靠性，是一项令人却步的工作，它等于是要求重新考虑并重新商议一些有关当前现存社会形态的最基本假设——这些假设被牢牢控制，它们是被默认的、无形的、不宜明言的东西，它们侧身于讨论或者争论之外。正如科尼利厄斯·卡斯特里亚迪斯最近所言，当今文明的困境在于不再自省。一个社会，若是遗忘了问的技艺，或者任这一技艺荒疏，就不能指望找到困扰它的问题的答案——无疑，即便找到，业已悔之晚矣，而答案之正确与否也不再重要。我们多么幸运，这一必然性不会降临——我们已经意识到它可能发生，我们要求保证它将不会发生。社会学就在这里开始登上舞台，扮演起一个负责的角色，它无权利为推卸责任而辩解。

本书的整体论证架构在于这样的一种观念：个体自由只能是集体活动之结果（其安全与保障只能是集体性的）。即使我们如今向着以私人化的方式来保证/确保/保障个体自由的方向发展——而且，倘若这是针对当前病症的疗法，那么，正是这种疗法，导致了最险恶、最恶劣的“医源性”病症（大众贫困、社会冗员过剩和对周遭环境的恐惧，是

* 戈尔迪之结 (a Gordian knot)，希腊神话中弗利基亚国王戈尔迪打的难解之结，按神谕，能入主亚洲者才能解开，后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挥剑将其斩开。该词后来比喻复杂难解之问题。——译者注

其中最显著者)。我们已经经历了一段乌托邦与善的模型的私人化过程（“善的生活”的模型推开并斩断了善的社会的模型），这使当前的困境与补救的前景更为错综复杂。将私人困境重新锻造成为公共问题的技艺正有被荒废、被遗忘的危险；在某种程度上，私人困境往往被这样来认识：难以使这些私人困境的“混杂物”，意即它们的“积聚之物”，转变为一种政治力量。力图使这种转换再度成为可能，是本书讨论的目的。（显然，能否做到，这里亦无法肯定）

政治含义的变迁是第一章的主题。第二章讨论的是现行政治之行动机构的困境及其有效性下降的原因。第三章将勾勒一幅引导亟需改革之视野的宏伟蓝图。至于后意识形态世界中的意识形态，后传统世界中的传统，以及为“价值危机”所困扰的社会共同价值，它们的前景将在这一章的不同节中陆续讨论。

本书诸多内容备受争议，原不出作者之所料。最受争议的恐怕在最后一章，原因有二。

一个自律社会或致力于成为自律社会所孕育并流传的视野必然纷然杂陈、形色不一，因此，若有人期望避免争议，他就必须得压抑对当前状况的其他选择的思考——更不用说去思考那些胜过现行状况的更好选择（我们知道，邪恶在平庸之中能寻到其最佳之同道，而平庸则化终极智慧为例行公事）。但是，使这一章更具争议性的还在于，这样的一种视野如今已声名狼藉。“历史的终结”可谓风靡一时，困扰前人的最争论不休的问题全然迎刃而解，或因未加注意而以为被解决（只要加以注意，都会认为这些都是问题）。我们栖身于“后意识形态”或“后乌托邦”时代，不再关心有关善之社会的视野，以追逐个人满足的自由来取代对公共利益的忧虑，这些原是应该令我们感到羞耻的，而我们却沾沾自喜，引以为荣。倘我们不再思索，对幸福之追求何以常常无法产生我们殷殷期盼之结果，何以不可靠之苦涩滋味使极乐之境并不像所说的这般甜美——如果我们不能唤回那些被放逐的信念，诸如公共之善、善之社会、平等、正义等等，我们就无法前行——那么，除非我们

与他人一起来关怀并培植这些信念，否则它就毫无意义。不诉诸政治、不以政治机构为载体、不规划政治机构之行动方向，就不可能从个人自由中驱除不可靠性。

在规划行进路线时，明确的方向看来尤为关键。第三章聚焦于三个方面：国家与公民的共和模式；作为普遍权利的基本收入；通过把握此刻侧身于控制之外的权力，使自律社会之制度得以扩展，以恢复其授权之能力。讨论这三个方面，意图在于激发并推动认真的思考，而不是提供答案。在一个自律社会中，答案无论如何只可能来自政治行动的遥远终点而不是起点。

我恰恰认为，问题很少有错，出错的更可能是答案。我还以为，最糟的回答就是回避问题。

1998年8月

目录

致谢 / 1

导言 / 1

第一章 寻找公共空间/1

政府大楼四周的徘徊者 / 2

Unsicherheit 的煎熬 / 7

不可靠之可靠性 / 10

不确定之确定性 / 15

不安全之安全 / 22

飘浮不定的恐惧 / 39

人类居住的星球正在冷却 / 43

第二章 寻找机制/50

恐惧与笑 / 51

自由何以自由? / 55

政治之解构 / 63

私人与公共相遇之处 / 69

被攻击的 *agora*: 两类侵犯 / 77

对 *paideia* 的回忆 / 90

附录一 后现代世界之意识形态 / 101

附录二 后现代世界之传统与自律 / 123

附录三 后现代性以及道德与文化危机 / 131

第三章 寻找视野/144

第二次改革与组合人 (*modular man*) 的诞生 / 147

部落、民族与共和 / 151

寻找政治

自由主义式民主与共和 / 156

分道扬镳 / 158

不确定之政治经济 / 161

不确定世界中之平等之根源 / 164

基本收入问题 / 169

召回流放中的普遍主义 / 178

文化多元主义——还是，文化的化合？ / 185

差异世界中的共同生活 / 188

译名对照表 / 192

译后记 / 196

第一章

寻找公共空间

英国西部的三个小镇，为一则传媒广泛报道的事件而闹得满城风雨，这就是恋童癖者悉尼·库克已从监狱获释返家。《卫报》记者戴克·埃肯海德^[1]以其天赋之社会直觉，作了评述，其丰硕成果我们将反复引用：

如果今天还有什么事能够让人们走上街头的话，那无疑就是风传的恋童癖者的到来。这种抗议是否有用，正日益遭到怀疑。然而，我们却未曾问，这些抗议真的与恋童癖者有关吗？

埃肯海德把焦点对准其中的一个小镇尤维（Yeovil），她发现，那些很少表达他们对公共行动的预期的各色人等，如：奶奶们、孩童们、女生意人，这次甚至在没有搞清楚库克是否真的躲藏在当地警察局的情况下，就长时间地包围了警察局大楼。他们对事实之无知倒还在其次，重要的首先是他们采取行动的决心，而且他们还使这些行动广为世人所知。他们对事实不过出于模糊的臆测，所以才有那么大的决心。那些一辈子对公共抗议都避之唯恐不及的人，这次都来了，呆着不走，高喊“杀了这狗娘养的”，打算不获得满意的结果就绝不撤离。这是怎么回事？除了将一个他们从未谋面且在哪里他们都丝毫不能肯定的公敌关押起来之外，他们还企求什么呢？

埃肯海德对这一让人困惑不已的问题，提出了具有说服力的回答。